



中国农村研究·政治系列

身份政治

国家整合中的身份建构

——以土地改革以来鄂北洪县为分析对象

李海金◎著

Shenfen Zhengzh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农村研究·政治系列

身份政治

李海金◎著

国家整合中的身份建构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身份政治：国家整合中的身份建构 / 李海金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5

ISBN 978-7-5004-9547-5

I. ①身… II. ①李… III. ①公民 - 身份 - 研究 - 中国
IV. ①C912.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4570 号

策划编辑 冯春风

责任编辑 李尔柔

责任校对 刘 娟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25

插 页 2

字 数 256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迁，也成为学术界最重要的学术对象之一。我们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人员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从事农村基层政权研究，1990 年前后由四川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农村基层政权研究系列丛书。20 世纪 90 年代，我们的研究重心主要为村民自治和村级治理，并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村治书系”。到 21 世纪初，我们的研究领域由村治扩展到乡村治理，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了“乡村治理书系”。现在，我们决定以“中国农村研究书系”作为本中心长期使用的学术品牌。其理由：一是自 2000 年本中心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来，其研究内容大大扩展，不仅以乡村治理为研究重点，而且涉及农村经济、农村社会、农村文化、农村教育、农村历史等。原有的书系名称已无法涵盖现有的研究内容。二是学术研究贵在持之以恒，更在于是一项以探求学理为唯一使命的事业。中国的学术由于一直伴随着问题而经常非学理化。“三农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中国农村研究”作为本中心一个长期使用的学术品牌，将致力于中国农村的实证调查和学理研究，以此标志我们进一步的学术自觉。

编 委 会

2005 年 5 月

总 序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文明大国。

中国是一个世界农民最多的大国。

中国是一个正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急剧转变的发展中大国。

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世界性难题，也是中国的世纪性难题。20 世纪以来，中国在解决这一世界性和世纪性难题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过惨痛的教训。进入 21 世纪，农村和农民问题还将存在，并会呈现出新的特点。一个古老农业文明大国迈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过程如何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事，也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和广阔的空间。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组织撰写、编辑、出版“中国农村研究丛书”。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心人员就致力于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1990 年前后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农村基层政权研究系列丛书”，1992 年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了《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1995 年由武汉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等专著。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村治书系”（一套 10 本）。21 世纪初，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乡村治理书系”。2005 年，我们决定以“中国农村研究书系”作为本中心长期使用的学术品牌。

我们撰写、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主要目标有四个：一是观察、记录、研究中国农村的变革历史；二是研究中国农村变革发展中的问题；三是挖掘和培育中国农村实证研究学者，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四是建设中国农村研究学者交流对话的平台，特别是为学者们立足中国本土经验，建

构既能够解释中国农村，又能够解释世界农村的分析框架提供交流和对话的平台。

鉴于这个目标，“中国农村研究丛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中国农村研究丛书”以经验研究为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以实证研究见长，过去以定性经验研究为主，近几年随着“百村观察”和“中国农村数据库”的建设，计量实证研究也开始起步。“中国农村研究丛书”的经验性成果既包括田野调查成果，也包括在历史的“田野”中调查的成果；既包括定性经验研究，也包括定量经验研究；既包括案例研究，也包括计量研究。

“中国农村研究丛书”以跨学科研究为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是教育部综合性的农村研究基地，以研究农村政治问题为主，同时研究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我们期望从不同的学科、视角解剖中国农村、研究中国农村，形成对中国农村的整体认识。因此，“中国农村研究丛书”也烙上了跨学科的烙印，不仅出版的成果具有多学科的特点，而且大多数成果打破了学科壁垒，跨越了学科界限，运用了多学科的方法研究中国农村问题。

“中国农村研究丛书”是中心成果的展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走过 20 年的历程，形成了独特的研究风格——实际、实证、实验，即“三实”研究风格。中心的研究正处于一个从方法论的自觉阶段转向自为阶段、从理论建构的洞察力阶段转向概念化阶段、从粗放式研究阶段转向精致化研究的阶段。“中国农村研究丛书”将集中展示中心及其学者的转型研究和最新研究成果。

“中国农村研究丛书”具有开放性和发展性。“中国农村研究丛书”是一个开放式的平台，具有发展性和持续性。“中国农村研究丛书”将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中心的学者的著作为主，同时吸纳优秀的中国农村实证研究成果。我们希望，“中国农村研究丛书”能够变成中国农村研究学者、各个学科的学者对话的平台。丛书将在中心“三实”宗旨的指导下，长期撰写、编辑、出版中国农村研究的优秀实证研究成果。

“中国农村研究丛书”与“中国农村调查丛书”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两类主要的系列丛书。“中国农村调查丛书”包括四个

子系列：一是中国农村调查·名村系列；二是中国农村调查·名人系列；三是中国农村调查·调查报告系列；四是中国农村调查·咨询报告系列。“中国农村研究丛书”与“中国农村调查丛书”是中心的两类姊妹丛书，前者以学理为主，后者以应用为主；前者以个案研究和计量研究为主，后者以调查报告和研究报告为主；前者立足实践，但超越实践，后者立足实践，也服务实践。

作为学者，作为教育部综合性的农村研究中心，我们有自己的学术理想和理论抱负，希望通过“中国农村研究丛书”的撰写、出版，促进中国农村实证研究的发展，促进中国农村实证研究学者的成长，同时在研究发展中形成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农村实证研究。

徐勇

2010年5月12日于华师桂子山

序

身份是指出身和社会地位。而每个个体都是以特定的身份进入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并使得政治充满着特定的时代特点和光谱，由此有了所谓身份政治。在当今世界一体化进程愈益猛烈之时，连美国政治学大师亨廷顿都曾经惊呼“我是谁”，提出了身份政治问题。在中国，身份政治理论开始引起重视，但运用这一理论框架分析中国乡土社会和农民问题的论著还很少见。读者拿到的李海金这本著作便是为数不多的论著之一。

身份是个人进入社会的标识。在中国长期的历史里，农民的身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职业性标识，如“士农工商”。农民的政治身份主要是国家的纳税者。他们被排斥在日常政治生活之外。只有少数人通过读书进入官僚系统，将“农”转换为“士”才取得了政治身份，并获得相应的身份待遇。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废除帝制，建立共和。每个人都成为平等的国民，取得了国民资格，享有相应的国民权利。农民开始具有平等的国民政治身份。但是这一体制只是“悬浮”在文字层面，而没有进入实际生活之中。换言之，农民并没有获得国民政治身份认同，国民身份只是一个符号。真正使广大农民具有政治身份认同的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发生于上层的辛亥革命不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一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底层革命。

底层革命需要底层动员。动员的重要方式就是政治身份的界定和赋予。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身份认定单位是“阶级”，即依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从而建构阶级的自我意识和认同，并以此作为阶级斗争的力量。《毛泽东选集》首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宗明义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

命的首要问题。”^①毛泽东将农民划分为半无产阶级，属于“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随着农民运动的兴起，他又将农民视之为革命先锋，特别是无地和少地的贫农则是革命的主力军。由此，中国传统社会中划分不同身份的财富性的“大户”、“小户”等概念被极具政治性的阶级身份概念所取代。在20世纪革命中，阶级的身份比国民的身份更具有实质意义，影响也更为深远。革命动员与阶级身份是身份政治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在乡村，土地革命是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的再分配，分配的依据便是阶级的归属和划分。如属于贫下中农就可以获得土地，属于地主富农的就必须交出土地。在土地革命中，乡村社会成员都获得一个影响他们实际生活和生存的符号：“阶级成分。”阶级成分决定其社会地位和社会待遇。这比抽象的国民身份更能深入人心。正是在底层革命中，阶级身份进入到乡土社会生活之中。所以，中国农民是以“阶级”而不是“国民”的符号第一次获得其政治身份的。

身份本来具有特定的时代内容和特点。特别是具有赋予性特点的身份更会由于其身份内容的变化而变化。如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本来是根据对土地的占有不同而划分。随着重新分配土地的革命的完成，占有土地的状况完全改变了，其原定的阶级成分就失去了意义。1950年土地改革完成后，执政党就明确宣布，原有的地主经过一段时间也可以同其他人一样获得同等的集体“社员”的资格，即获得新的身份。但是，革命有其历史的惯性。特别是随着领导人“继续革命”思想的确立，革命时代的阶级划分延续下来。这种成分不仅仅是基于生产资料的占有，而是具有血缘性。不仅仅是具有原有身份的人不能因为改变了经济地位而改变其政治身份，就是他们的子女也要继承其前辈所具有的身份。当时所说的“帽子”极具形象化意义。“帽子”不是实体意义的符号，而是更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如“地主”早已因为土地被分而不再是地主，但由于他们原属于地主而仍然必须戴上地主的“帽子”。他们的子女也因此成为“地主子女”，尽管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属于自己家的土地。这种符号性的身份具有强烈的建构性而不是实在性。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页。

身份是一种社会地位的标识，它既具有凝聚性，又具有排斥性。通过身份界定和赋予，将一部分人凝聚在一起，同时将另一部分人排斥在外。中国革命正是由于阶级身份的建立而获得成功，从此改变了整个社会大众的生活和命运。后革命时期，由于革命的惯性，使得革命性身份延续下来，并继续影响着人们的身份。如原有地主的子女从来没有享有过地主的种种“好处”却不得不享受当子女的种种“坏处”，即因特定身份而被社会所排斥。这种排斥显然不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1970年末期，当执政党决定停止“阶级斗争为纲”而转向经济建设战略时，所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摘掉原来划为地主富农等成分的人的“帽子”，这些人与其他人一样成为国家平等的公民。

国家是人构成的。新中国是经过革命建立的，革命时期的政治身份主要是阶级，所建立的国家是阶级国家。随着以改变生产资料占有为目的的革命的完成，国家的社会构成是公民，国家因此成为公民国家。这又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第一次变革，即革命，使得农民前所未有获得阶级性政治身份，并获得了土地及相应的政治权利；第二次变革，即公民国家的建立，将使他们获得公民性政治身份，并获得一系列相应的公民权利和待遇。可见，身份的确立对于人的生存和命运极具重要意义。

李海金的著作以湖北省的一个县为实例，对于土地改革以来农村社会身份的变化及其影响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向读者展示了身份政治是如何在一个县的实践中演绎的。该书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农村身份政治的原始起点。认为传统中国农村社会，身份系统的基本特征具有等级性，并具有较强的先赋性、自然性、强制性和稳定性。土地改革促使传统身份制的改变，是国家对基层社会改造和重组的重要手段。而土地改革完成后，阶级身份进一步延伸、扩展、强化，以至于泛化。直到改革时期，“阶级”身份淡化，“公民”身份确立。

该著作与其他的中国农村研究论著相比，有以下突出的特点：

一是从身份政治的角度介入。现有农村政治著作中，大多是从国家、基层组织制度的角度介入的。李海金的著作从身份政治的角度介入，可以将宏大的政治变迁与微观的个人生活密切地勾连起来。从这部著作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般的政治社会的变迁，更可以看到这种变迁在个人生活

中的体现：不同的身份获致不同的命运。政治著作不再是抽象的制度演绎，而具有丰富生动的人生内容。政治学是研究制度的。但它的终极目标是人。制度设计和改革是为了人更好的生活，以人为本。只有以人为本的政治才是好的政治。评价政治的标准是人的生活。革命的正义性在于通过阶级身份的认定及阶级动员，实现了大多数劳动阶级的解放。改革的正义性在于公民身份的认定得以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共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二是从国家整合的角度介入。身份本是一种客观的实在。但是身份的确立和界定极具建构性。李海金的著作将国家整合引入农村身份政治分析之中，认为借助阶级身份成功实现了对乡土社会的改造和重组；而阶级身份的强化和泛化则不利于国家的广泛整合和普遍性认同，最后通过公民身份实现国家更广泛意义的整合。这一思想显然是极具现实价值的。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在于财富，更重要的在于认同的广泛性和深入性，即所谓人心。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身份比阶级身份更具有包容性。这也是我国在停止“阶级斗争为纲”口号后愈来愈重视公民身份的重要原因。

三是新实证方法的介入。李海金的著作以一个县为实例，从事实出发而不是逻辑出发，通过大量的事实资料来展示身份政治在乡土社会的演进。这是实证研究方法的基本要求，也是其价值所在。但实证研究不是简单的材料罗列，而需要从事实材料中提炼加工，从而寻找其规律性类型化的概念。我国政治学界做实证研究起步较晚，能够通过事实调查发现规律并提升到学理层面则更少。李海金的著作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正因为是尝试所以该著也有诸多不足。海金是我指导的博士生，受过良好的社会学方法的训练，博士生学习的是政治学理论专业，具有学科交叉的优势和较好的学术潜力。我对他寄予很高的学术期待。由于各种原因，博士论文与预期有一定距离。但他并没有放弃积极努力。本书便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我相信，以本书出版为新的起点，他会在学术之路上走得更好！

徐勇

2010年5月22日于武汉

目 录

导论	(1)
一 研究缘起	(1)
二 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	(7)
三 研究思路与文献梳理	(9)
四 核心概念与理论资源	(15)
五 研究区域概况	(19)
第一章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分层与身份系统	(22)
一 社会分化与社会分层	(24)
(一) 社会分化有限的村庄	(24)
(二) “富不过三代”	(28)
(三) 农民的破产与社会趋向均等化	(31)
(四) “阶级分化”与社会分层	(36)
二 农民身份系统：状态与特征	(44)
三 农民政治性格与国家观念	(51)
第二章 “阶级成分”：农民政治身份的颠覆与重构	(62)
一 阶级划分的前奏：政治动员与凝聚阶级意识	(65)
(一) 政治动员	(66)
(二) 凝聚阶级意识	(74)
二 划分“阶级成分”	(80)
(一) 阶级划分的政策	(81)
(二) 阶级划分的实践	(87)
(三) 阶级划分的政治社会后果	(102)
三 政治认同与农民国家观念的转变	(114)

四	社会政治秩序与国家整合机制的转型	(122)
第三章	社员：资格条件、资源分配与社会差别	(133)
一	合作社社员：阶级身份的延续与扩展	(136)
(一)	入社的资格条件与阶级区分	(140)
(二)	社员的政治社会待遇	(149)
(三)	农民意愿与国家导向	(152)
二	公社社员：阶级身份的延续与泛化	(160)
(一)	阶级身份的强化与社员的资源分配	(160)
(二)	社员的行为选择及其动因	(170)
(三)	“文化大革命”：阶级身份的泛化	(180)
三	阶级身份的终结	(184)
第四章	公民：个体化社会、国民认同与社会分层	(187)
一	革命消解、阶级淡出与社会转型	(188)
二	公民身份与国民身份	(194)
三	个体化社会的兴起	(208)
四	社会分层体系的新趋向	(217)
五	国家整合与国民认同的双重转型	(222)
结论：	身份政治学的尝试性研究框架	(225)
参考文献		(231)
后记		(247)

导 论

一 研究缘起

（一）研究方法上的反思

当前，乡村研究或曰农村研究日益成为一大学术热点。在这一研究热潮中，不仅仅是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乡村研究的“正统性”学科将之作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而且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如经济学、历史学、法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也借助它们独有的研究资源进入乡村研究领域，极大地丰富了乡村研究的研究视角、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也在一定意义上提升了其研究水准和研究层次。无独有偶，农村、农业和农民即“三农”也日渐显现为一个焦点性公共话题，电视、电台、影视、网络等大众传媒都以“三农”为其一项重要的主题来源。“农民”这曾经被歧视为“泥腿子”、“乡下人”的边缘群体，逐渐纳入官员、学者甚至社会公众的视野和讨论中心。对于从事乡村研究的学者来说，本为一大幸事。但是，从学术研究的意义上而言，这一凸显的“知识爆炸”在扩展乡村研究的学术资源之时，可能会引发深层的方法论甚或研究方法上的“困境”，即如何将学科性理论和方法与乡村研究的主题有机整合起来。换言之，我们所借助的研究资源与研究对象、研究主题之间能否在信度和效度两个方面达致一定的契合水平，从而获得较高的学术增量，提升学术研究水平和研究层次。

近年来，笔者一直在从事中国城乡基层治理与社会发展方面的研究。在理论资源的储备和实证研究的展开过程中，怎样将自己的知识储备与研究对象有机联结起来，即如何将实证调查与理论研究融为一体，两者都不偏废？对实证研究持批评态度的学者往往指责这种研究取向只

见“材料”，只有对研究对象的一堆描述性材料，而没有对这些调查材料进行学理性分析和解释。从科学研究的层次上来说，就是只停留在第一个层次描述性研究，而没有提升到第二个层次解释性研究甚至第三个层次预测性研究（或探索性研究），仅仅解决了“是什么”的问题，而没有回答“为什么”，更没有预测“怎么样”^①。而要将实证研究提升到较高的研究水平，就需要从特殊性的调查材料中提炼和挖掘出一般性来，从一个典型性的个案或区域研究中达致对某项“社会事实”甚至整体社会的一般性理解。否则，要么是实证材料的简单堆砌，要么是理念层面的逻辑推导。或者换个角度设问就是，如何将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结合起来，如何在宏观与微观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立足于个案研究（及区域研究、类型研究等），但又超越特殊性并挖掘出一般性来？^②

笔者的硕士学位论文曾经做过这样的探索。论文在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特殊性生长路径——宏观的制度背景与微观的基层变动相互交融的问题意识之下，试图将一个新型城市社区公共参与组织置于宏观变迁与微观行动之中进行多方位、多层面的考察。通过这项实证研究，我们对城市社区建设的生成逻辑、社区公共参与的拓展路径、社区发展的困境及化解和基层民主的推进方式等有了一些新的初步认识。^③ 不过现在看来，这一研究努力在研究方法的开拓方面还很不够。

自笔者进入农村研究领域之始，农村研究也开始萌生研究视角转换的趋向。当下的农村研究——或者更为准确地说，“三农问题”之所以显现为“热点”问题，起始于村民自治研究的兴起，及在此研究过程中牵引出来的一系列社会政治现象（尤其是如今看来具有一定阶段性的矛盾和

① 徐勇先生曾从方法论层面对当下农村研究的经验性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反思，该文对笔者启发极大。参见徐勇《当前中国农村研究方法问题的反思》，《河北学刊》2006年第2期。

② 这种研究路径的形成与延伸受益于邹说先生。参见邹说《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③ 详见李海金《公共参与中的社区生长——以武汉关社区论坛为例》，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问题^①)及其研究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言,村民自治实践,即政府对乡村基层民主的推进为村民自治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平台和课题,学术研究活动受到较多来自政府行为和政策驱动的外在推动,其问题导向和对策性特质较为明显。而且由于理论研究滞后于社会实践,农村研究更多的是对先行的实践进行描述与解释,很难在与社会现实保持相对距离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农村研究的学术自觉性和学理性追求。在这一情势之下,乡村研究者有意识地将研究时段向前后伸展,把共时性研究和历时性研究结合起来,将村民自治甚至乡村社会置于较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之中进行全方位、多层面考察。^②在这些学术努力中,以村庄为分析单位的个案研究或比较研究,及以村庄为基点的自下而上研究路径就日益成为农村研究领域备受推崇的研究类型和研究视角。这一研究取向与社会史领域的研究转向可以说是不谋而合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在经过新中国建国初期30多年的曲折发展之后重新回归其学术传统,重视“眼光向下”和“自下而上”的研究立场,将研究视线移向下层民众,从民众的视角和立场审视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以及重大历史事件,并进一步推进区域社会史研究。^③

这种研究取向相对于以前正统的政治史观而言是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的。它不再仅仅将研究视点局限于政治上层、政治精英和宏大的历史变迁,而将研究视野更多投射于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关注基层社会的微观变动和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探寻不同样式的历史事实,进而获致对乡村

① 对之作出直观描述的代表性著作有《我向总理说实话》和《中国农民调查》。参见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② 在这方面作出大学术努力的是于建嵘和吴毅的两篇博士学位论文。参见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张鸣对村民自治研究也表达过类似的忧虑,“近年来对于农村政治的关注似乎太多地集中在村民自治的现实上面,……中国农村的政治是凝结了历史的政治,不厘清历史的脉络,现实的结就难以真正解开”。参见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③ 较有逻辑关联性的梳理和评述可参见赵世瑜《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5—33页。

社会更为多样化、多层面的理解和认识。但是，这种研究取向仍然存在一定的限度。这一限度是与中国乡村社会自身的特性和乡村民主的成长、发展路径紧密相关的。近代以来，村庄越来越深地卷入到各种外来势力的“有计划的社会变迁”^①之中，日益丧失其自主性与内生性。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来说，外在力量对村庄的影响深度、广度和力度尤甚。这就使乡村社会带有更强的外在建构性和规划性的特性。同时，中国乡村民主的成长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由国家赋予的，是体制性行政放权的结果。^②在这样的两大背景之下，“自下而上”、内向型的研究取向在丰富我们的想象力的同时却很难获得对所研究“社会事实”的一般性和总体性理解，或曰建构一种“整体的历史观”^③。在这样的研究困境下，就需要“将‘自下而上’的研究与‘自上而下’的研究结合起来，更加注重‘自上而下’的研究，即从国家的视角看待农村社会”^④。进而言之，我们在以村庄为研究单位展开历史向度的研究之时，必须将内生性变量和外生性变量综合起来考察，也就是要把宏观历史变迁与微观社会（政治）行动、宏观结构与微观经验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洞察研究对象的多重面目与多层镜像。

在进行这些思考之时，我的恩师徐勇教授提议做一项研究，就是土地改革以来国家如何通过初始的阶级划分以及后来延续至今的身份建构实现对农村的政治性整合，并构筑农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这就为我的上述思考提供了一个实验场。

（二）问题的提出

本书是在近现代国家与农村社会、农民之间关系变迁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20世纪之前，国家与农村社会、农民的关系较为松散。“王权止于

① 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② 关于中国乡村民主成长路径的分析可参见徐勇《村民自治的成长：行政放权与社会发育——1990年代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发展困境的反思》，《开放导报》2004年第6期。

③ 赵世瑜：《“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与整合的历史观》，《光明日报》2001年7月31日B3版。

④ 徐勇：《当前中国农村研究方法问题的反思》，《河北学刊》2006年第2期。